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0391—8081）教学参考资料

（0391—8081）教学参考资料

（一）

（0391—8081）教学参考资料

（0391—8081）教学参考资料

（0391—8081）教学参考资料

（0391—8081）教学参考资料

（0391—8081）教学参考资料

（0391—8081）教学参考资料

（0391—8081）教学参考资料

（0391—8081）教学参考资料

（0391—8081）教学参考资料

（0391—8081）教学参考资料

（0391—8081）教学参考资料

（0391—8081）教学参考资料

（0391—8081）教学参考资料

（0391—8081）教学参考资料

（0391—8081）教学参考资料

（0391—8081）教学参考资料

（0391—8081）教学参考资料

华侨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印

编者说明

为了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本教研室编印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胡华教授、副主任王琪教授和林茂生、刘炼同志，以及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史教研室金春明同志等几编学术报告，这些报告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和较高的学术水平，对当前研究党史和党史教学很有帮助。为此，我们特汇编本参考资料。此外，我们还附印了香港两个刊物中的两篇有关资料，以供参考。

华侨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一九八〇年三月

目 录

从“七八”会议到遵义会议的若干历史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 胡 华 (1)

对陈独秀评价的几个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 林茂生 (38)

关于瞿秋白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 刘 炼 (60)

关于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几个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副主任 王 琪 (89)

党史教学中有关刘少奇同志的若干问题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史教研室 金春明 (117)

刘少奇新传

..... (原载香港《广角镜》1979年第79期) (140)

刘少奇生平年表 (1898—1969)

..... (原载香港《争鸣》1979年第17期) (163)

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的 若干历史情况

胡 华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今天我的汇报发言，刚才主席讲过了，就是“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的若干历史情况”介绍一些历史情况，根据搜集到的材料，访问了一些老同志，结合我们党史教学中常常碰到的一些问题，把它串一下，不一定准确，供参考。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转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从党的领导来说，1927年7月10日左右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就改组了党中央，成立了一个临时的中央政治局（平常我们看到有些材料中叫五人临时中央政治局），按当时排列，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实际上是七个人的临时政治局，还有瞿秋白、蔡和森。7月8日左右，共产国际发来指示，将陈独秀免职，因为陈也领导不下去了，鲍罗廷当时是国际代表，也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最高顾问，他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个会议没有让陈独秀参加，这会是改组中央，当时让陈独秀隐蔽在汉口一家文具店，装个老板的样子，这是我们党的一个机关，把他隐蔽起来，让瞿秋白代替陈独秀的工作，因为瞿秋白写过“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这样一些比较系统地批判陈独秀的文章，所以当时让瞿秋白代替陈独秀工作。这个七人临时中央也

叫中央非常委员会。这个中央非常委员会决定了三件大事：

一是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里发动了一次起义。地点准备在南昌或九江。因为我们党能掌握的叶挺部队和贺龙部队从属二方面军，部队里有大量党团员。

第二件是决定四省秋收起义。即在我党领导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起义。

第三件是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就是后来的八七会议。因为瞿秋白跟着鲍罗廷上庐山去规划以后的工作，筹备八七会议。蔡和森养病去了，在汉口当时主持工作的就是五个人，所以当时又叫五人中央政治局。

7月12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开始抓人，7月12日七人临时中央发表一个宣言，退出国民政府，痛斥汪精卫集团的叛变。不久宋庆龄也发表了斥责汪精卫叛变的宣言。

关于南昌起义。临时中央决定周恩来同志作为前委书记去领导起义，在“七·一五”以后，中央派了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高语罕他们先到九江了解情况，做准备工作，周恩来同志7月20日从汉口动身，到九江开了会，决定在南昌发动起义。他在26、27日到了南昌，与朱德、叶挺等同志领导起义准备工作。在7月23日共产国际新任命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到了汉口，瞿秋白也从庐山回汉口，7月26日共产国际来电报，主要意思是暴动如果有把握就进行，没有把握就不进行，这个电文并没一定要停止暴动。罗米那兹和临时中央在汉口的几个人开会，决定派张国焘到南昌去送国际的指示，但是并没有派他去停止暴动。而张国焘还是继续执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我们单独领导起义力量不够，需

要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起义才有把握，张发奎是亲近汪精卫的，要他跟我们起义是幻想，这还是陈独秀的右倾思想。所以恩来、立三、代英等许多同志在南昌坚决顶住了张国焘的错误意见，领导了有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周恩来同志当时是个29岁的青年，领导了三万多人的伟大起义，这充分说明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概。张国焘写了个回忆录，叫“我的回忆”，他就把这件事歪曲成共产国际派他去南昌阻止暴动，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歪曲事实。（张国焘这个家伙后来听说在加拿大多伦多的老人院中，七三、七四年看到参考资料宣传说他死了，最近从香港的明报看到张国焘还活着。上次我们接待加拿大的林达光教授，他说曾去找过张未找到，他估计这个人活着，准备回去再找一找。）

八七会议是瞿秋白同志主持的一个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的，现汉口已搞展览馆。过去八七会议文件写了个“于九江”，这是故意写的，为了迷惑敌人，因为“告全党党员书”要散发的，就象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开的，写“于庐山”也是为了迷惑敌人，实际上在庐山是怎么开呢？所以我们有时看历史文件也要鉴别，不要以为历史文件就千真万确，当时有当时的具体情况。八七会议发表了“告全党党员书”，这个“告全党党员书”是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格鲁吉亚人，是斯大林的同乡，）由他听了汇报以后起草，由瞿秋白翻译出来，经瞿秋白、李维汉这些同志进行了修订。八七会议开了一天，因为是紧急会议，当时北方同志都没有来，主要是湖南、湖北、武汉、安徽、江西等附近几个省的，邓小平是秘书长，毛主席到会，李维汉，陆定一等参加了。毛主席在会上讲了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这些正确意

见。大会也这样做了。毛主席在会上讲，我们参加到国民党里面去是要做主人而不是要做客人，国民党好比是一座房子，我们搬进这座房子去做主人，去领导国民党，不是做客人，做助手，过去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陈独秀放弃了领导权，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告全党党员书”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湖南十万农军包围长沙，与事实有出入，去年由李维汉，易礼容，罗章龙等当时在场的同志回忆，当时情况是这样：五月廿一日在长沙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湖南省委，省农民协会，工会受到突然袭击，省委的负责人夏曦、郭亮他们就跑到武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省委一时散掉了，无人负责。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柳直荀同志（柳直荀就是“我失骄杨君失柳”那个柳直荀）跑到株州，打电话给各县农民协会，要求各县农协动员农军到长沙会师，浏阳中心县委书记潘心源，带浏阳、平江农军几百人，几百条枪和一些梭标队，到了长沙郊区，跟敌人岗哨接触。路上遇到从武汉中央派来的李维汉同志。李维汉同志说：长沙许克祥有武装三千多人，你们农军几百人进攻长沙怕不行，中央已派谭平山组织考察团到长沙处理马日事变问题，你们是否等他们来，等一等中央指示，这样潘心源就带领浏、平农军退回去，这就是“静候中央解决”的情况。当时其他县的农民有的是到半路，有的正准备出发，听到这情况也就退回去了，当时如果把各地农军在湘东集中起来，再攻长沙，就对了。单纯等候中央解决，叫他们退回去是不对的，失去了时机。当时陈独秀反对打长沙，国际共产代表也不同意打长沙，李维汉同志传达了他们的意见。但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是已经有了十万农军，已经包围了长沙，再由中央下命令叫他们退回去。这

件事当时潘心源同志、柳直荀同志都向中央写了报告。“马日事变”后，鲍罗廷、陈独秀和中央想采用自上而下的和平办法来解决，因为许克祥、何健是唐生智的部下，所以陈独秀找汪精卫、唐生智商定用武汉国民政府名义派一个考察团去解决马日事变，由谭平山、鲍罗廷、唐生智的两位代表和武汉国民政府一位代表，组成五人考察团出发到长沙去。到岳阳他们打电话和湖南省政府联系，省政府主席周澜回电说，“请你们不要来”，周也是唐生智的部下，电报措词极不礼貌，不管怎么说国民政府是上级，省政府是下级，谭平山知道这是唐生智授意的，表面上派两位代表，派考察团，却又让周挡驾，谭、鲍考虑，如果到长沙也解决不了问题，只好回武汉。

毛主席主张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进行斗争，他请求中央派他回湖南处理，陈独秀没有办法也就同意了派毛主席主持省委工作。毛主席受命于危难之时到了湖南，毛主席到湖南十多天，积极组织群众，陈独秀不放心，又把毛主席调回来。局势越来越紧张，当时中央决定各方面负责人和知名人士都疏散。陈独秀决定毛主席到四川工作，毛主席坚持要求回湖南，当时回湖南很危险，大家认识他，毛主席不顾危险。七月中旬，武汉改组的新的党中央同意派毛主席、罗章龙两人以中央委员身份去领导湖南省委的工作，他们分路到长沙郊区赵家坪办公，省委有夏明翰同志（就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夏明翰烈士）易礼容、滕代远，王一飞、罗学瓚、林蔚等。毛主席到湖南后，改组了省委，派人到湘东、湘南、恢复衡阳、株州、平浏一带党的组织。

八七会议前，中央来通知叫湖南派两名代表参加中央紧急会议，大家就推举毛主席和彭公达去参加。“八七会议”后，毛主席回到湖南，在长沙郊区沈家大屋召开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改组了省委，由彭公达负责，并决定举行湖南秋收起义。我们看彭公达给中央的报告，当时也有争论，有的主张整个湖南起义，有的主张湘南起义，毛主席主张在湘东、湘赣边起义，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最后大家同意毛主席意见，并决定里应外合，夺取长沙。会议决定由毛主席任前委书记，去发动湘东的平江、浏阳、安源一带，株州一带，湘南衡阳一带工农武装进攻长沙。由罗章龙负责在长沙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领导长沙城内外工农武装破坏从武昌到长沙的铁路交通，破坏铁路、大桥、组织武装力量，约定九月中旬，当毛主席带队打到长沙郊区40华里的黄花市的时候，城内外工农发动起义，配合夺取长沙，这是沈家大屋订的计划。但九月中旬毛主席带领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在平江浏阳一带遭到挫折，毛主席把失败后的队伍集中到文家市，毛主席派人送信给省委，说起义部队受挫折，决定不到长沙来了，长沙起义工作可以停止。这样毛主席就带了队伍到罗霄山脉的中段去开辟农村根据地了，这是很正确的，经过实践已经证明打长沙是不可能了，就不要再打长沙，也不要再在长沙里面进行暴动了。后来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时，瞿秋白把毛主席这次正确的退却，建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个正确行动，批判为退却逃跑，说他领导湖南秋收起义攻打长沙没有成功，失败了，撤销了毛主席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下面我们讲十一月扩大会议。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当

时中央搬到上海，是在上海英租界西区静安寺路开的，由瞿秋白、张太雷他们主持，共产国际代表还是罗米那兹，到会的有“八七会议”选举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还有“五大”选出的一些能到会的委员，有三、四十个人。罗米那兹作了政治报告，瞿秋白作补充报告，通过了一个决议，即《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决议》认为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要超越民主革命阶段转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全国都有直接革命形势，规定党的任务就是组织城市暴动和农村的农民暴动，这就开始了第一次左倾路线。

在组织上十一月扩大会议，好的方面是恢复了中央各部委，因为从武汉搬到上海各部委都没有建立起来，恢复了中央工委（工人运动委员会），中央工委由罗章龙负责，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由彭湃负责，中央军委（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恩来同志当潮汕失败后，到香港养病，后来十一月扩大会议从香港回到上海。谭平山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本来也是中央委员，南昌起义的革委会主任，这时因他活动成立农工民主党，所以党把他开除了。十一月扩大会议在组织上的错误就是实行了惩办主义，把当时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包括毛主席、周恩来同志等都用了惩办政策，给了处分。十二月发生广州起义。广州起义时机很好，因为当时张发奎把主力开出广州城同李济深打仗去了，守卫广州城的是一个二方面军的教导团，这个团有一千四百多人，武器很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党支部，有二百多人，有许多共青团员和同情革命的分子，团长就是叶剑英同志，教导团守卫广州城，城里我们当时还秘密恢复了有两三千人的赤色工人纠

察队，所以按当时的情况、力量是有把握举行起义拿下广州的。起义是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同志领导的，叶挺、叶剑英、聂荣臻、贺昌、陈郁、邓发、周文雍（当时纠察队总指挥）也参加领导了广州起义，但是起义胜利以后，张发奎很快地反扑过来，加上帝国主义炮击，轰击广州，当时起义军没有能够即时地撤出广州城，遭到了失败。广州起义从主要方面讲，利用敌人兵力空虚，举行起义，取得伟大胜利，拿下广州城，打开监狱，解救被捕同志，缴获大量物资，斗争非常英勇，可歌可泣。但另一方面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同志和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在起义胜利后没有考虑敌我力量对比，拒绝叶挺、叶剑英同志撤出广州的正确建议。他们还想占住广州城，结果失败。如果当时起义部队象周恩来同志那样在南昌起义以后。把部队撤出来，这就好了，当时张太雷同志还没有周恩来同志这样高的水平，周恩来同志知道南昌是不能守的，就撤出来。更没有毛主席这样高的水平，把部队拉到农村建立根据地。如果当时把部队拉出来，拉到海陆丰，甚至拉到粤北、梅县、五华、兴宁一带山区或闽西、赣南，这样根据地很快就可以建立起来。当时没有这样做。张太雷同志很快在战斗中牺牲了。叶挺、叶剑英他们指挥白云山战斗打得很激烈，且战且退。只有一部分撤退到海陆丰根据地，其他都打散了，牺牲了，失败了。后来海陆丰由彭湃、徐向前等同志坚持一段，但那里是低洼地，再加上政策上有些“左”，所以也失败了。

1928年2月湘南起义，就是湘南年关起义。这是由朱德、陈毅领导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为主力，配合湘南特委举行起义。朱德同志领导的部队叫做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

师，毛主席领导的部队叫做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朱德没有“第一军”三个字，另外镰刀斧头画的样子也不一样。第一师武器还是很精良的，当时朱德同志利用社会关系在韶关找范石生得到很多武器弹药服装等装备。当时有两三千人，宜章农军叫第二师，郴县农军叫第七师，邓永亭同志任师长。湘南是七个县的武装起义，中心是五个县：宜章、郴县、永兴、资兴、耒阳，再加上安仁县的大部分，桂东县的一部分，一共有一百多万农民起来参加起义，因为当时湖南农民被地主反攻倒算屠杀得很厉害，也是迫切要求武装反抗，要求起义，但是湘南特委执行了‘左’倾的烧杀政策，郴县、耒阳两个县城都破坏了，特委书记陈佐魁，宣传部长周鲁、共青团书记席克斯都执行‘左’倾路线，后来他们都牺牲了。郴县县委书记叫夏明震，就是夏明翰的弟弟，也被敌人杀害了。敌人就南北夹攻，许克祥、何健、范石生南北夹攻。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朱总司令就派毛泽覃（毛主席的弟弟）到井冈山跟毛主席联络，毛泽覃原来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来潮州失败后，编到朱德部队，朱德同志派他跟毛主席联络。毛泽覃就领路，由毛主席亲自带部队到湘南来接应朱德部队上山，当时上山有八、九千人，主力两、三千人，大大增加了井冈山的力量，增加了武器装备和军事指挥力量。农军也有的携带家口全家都来的，因为井冈山养不起这许多人，后来陆续让他们回去了。

主力撤退以后，敌人在湘南实行了残酷的屠杀报复，在耒阳被杀了一万多人，在永兴被杀了三千多人，我们在那时期是付出了很多流血的代价。

第一次‘左’倾路线在1928年4月由于大家抵制，就停

止了。

这样党就准备召开“六大”，来研究今后斗争方向。共产国际在1928年5月，指示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到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各地区各个省选派有代表性的工、农干部的党员去参加“六大”。

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郊区一个大农庄里开会。这个农庄原来是贵族的庄园，有贵族的小别墅，也有些农舍，树木很多，就在那里开会。到会代表一百多人，还有在莫斯科学习的一些同志，包括一些老同志列席了会议，还有些兄弟党的代表，如德国共产党的台尔曼同志列席了会议。当时全国党员由革命失败时一万人恢复到近四万人样子。参加“六大”的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大”选出来的中央委员，还有各方面的代表，比较大的代表团一个是广东代表团，苏兆征带队，北方代表团由王仲一带队，武汉代表团是项英带队，湖南代表团是罗章龙带队，毛主席在井冈山没有能去。还有江苏也有代表团，安徽也有代表团，都去了。

大会本来通知陈独秀，要他到会，但是陈独秀满腹牢骚，意见很大，闹情绪，他拒绝参加。

“六大”会议是由共产国际的书记布哈林来指导，具体的指导是当时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布哈林作了个政治报告，瞿秋白作补充报告，会议差不多进行了两三个星期，有小组讨论、有大会发言。这次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党的十大纲领，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也批判了瞿秋白临时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瞿秋白在报告中起初还认为革命是高潮，受到批判，他也承认了错误。张国焘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受到大家的批

判，批判他追随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从处理“三·二〇”事件，处理“党务整理案”，都是张国焘作中央代表，一直到阻止南昌起义。布哈林也曾经批判了张国焘，说“张国焘，看起来你这人个儿挺大，可是政治上是个小孩子，陈独秀这么多明显的错误，你怎么不能抵制呢？”

大会经过各个代表团酝酿预选人，经过预选然后提出了候选人名单，候选人数比当选人数多一倍，无记名投票选举，这是符合党章的。我们现在党的政治生活准则十二条明确讲不能搞同数选举，比如选十二人，划掉一个人，旁边另写一个人，他能选上吗？候选人应该比当选人多一倍，至少多三分之一，这样选举才是合法的，不能够搞同数选举。“六大”当时还是按党章办事情，选出了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毛主席没有到会，被选为中央委员。

选举中也有缺点，就是布哈林他们强调工人成份，因此选了一些工人出身，但是觉悟并不高，政治上不成熟这样一些人，包括当时选了个总书记叫向忠发。他是武汉摇船工人，后来叛变，文化很低，政治也不成熟，觉悟也很低。这是当时一个很大的缺点错误。我们说工人成份，阶级觉悟很高，政治上比较成熟，那当然很好。但是光管工人成份，阶级觉悟不高，政治上不成熟，品德又不好，像王洪文、黄金海、陈阿大之流是流氓，光工人成份有什么用？当然，“六大”也选出很多好的同志，如周恩来同志被选为常委，毛主席等许多好的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

“六大”后召开六届一中全会，一中全会在克里姆林宫里召开的，当晚斯大林同志亲自接见了当选的委员，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国革命处于两个高潮之间，他画了一个

倒“丛”，就是说，前面一个高潮过去了，后面高潮还没有来，你们在山谷里面，如果你们工作做得好，新的高潮是会到来的。给大家很大的鼓舞，斯大林同志要大家好好学习，要把理论结合中国的特殊情况。

六届一中全会选向忠发这么个人做总书记这是不好的，当时选李立三同志为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周恩来同志是常委兼组织部长、军事部长，把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他们留下来担任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以后，代表团回到国内来，传达“六大”的精神，党的精神面貌有很大振奋，工作也有很大发展，在“六大”以后党员数、红军数都有比较快的增加。但是还存在一些“左”的倾向，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问题还没有摸清楚。对于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像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经济大国，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没有解决；城市工作中是以发动斗争为中心，还是积蓄革命力量为中心，也没有解决。当时不要统一战线，不区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一律斗争，对黄色工会也斗争，搞关门主义，对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也排斥。这一系列问题，以及后来我们党的许多正确政策，如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工商业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等等，都是毛主席解决的。后来林彪、“四人帮”又搞乱了，又回到错误的极“左”路线上去，这是另一回事，不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

到了一九三〇年夏，周恩来同志到北方去巡视工作，后来又去莫斯科汇报工作，参加了俄共十六次代表大会。周恩来同志不在国内，李立三掌握了实权，因为向忠发水平很

低，觉悟也很低，没有什么主意，所以实权在立三同志手里，这时就发生了立三路线，也就是第二次“左”倾路线。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同志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个《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立三路线的表现有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对形势的估计，认为形势是新的革命高潮，可以发展到全国直接革命形势，可以由一省数省包括中心城市首先胜利，达到全国胜利，由全国总起义引起世界革命的总暴发，而中国革命又要在世界革命总暴发中才能胜利。这被称为半托洛斯基主义的观点。当时立三路线出现也有客观历史环境，1930年夏季，蒋、阎、冯中原大战。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在信阳一带大规模云集打仗，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围剿，各个根据地都有发展，红军发展到六、七万人，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也逐渐恢复，党员发展到六、七万人，城市中一些大工厂恢复了一些赤色工会，农村也有一些我们党领导的或自发的抗捐抗税的斗争，反动军队里头我们党也做了些工作，发生了一些士兵哗变的现象。立三同志把这些现象认为是全国革命高潮到来了，认为全国布满了干柴，只要一点火全国就会燃烧起来，这是对形势的估计。

第二，就是制定了全国总暴动的计划。用城市工人总暴动总罢工，发展到武装起义，夺取上海、南京、武汉。立三同志认为南京是蒋介石的头，拿下南京，蒋介石的头就砍掉了；上海、武汉是蒋介石的心脏，拿下上海、武汉，就把蒋介石的心脏挖掉了，就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要红军和各根据地配合攻打中心城市；要彭德怀同志的三军团打长沙；要毛泽东同志的一军团打南昌、打九江；要鄂豫皖的红四军、湘鄂

西贺龙同志的红二军团配合打武汉，叫做“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来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和引起世界革命的总暴发。立三同志以中国的列宁自居。

第三，在组织上把党、团、工会这些组织都停止了活动，把它合而为一，组成各级行动委员会，有中心行动委员会、江南行动委员会、华南行动委员会、北方行动委员会、武汉行动委员会。江南行动委员会是立三亲自挂帅任书记，李维汉任组织部长，陈云管外线工作；华南行委李富春负责；北方行动委员会贺昌负责，还有关向应同志；武汉行委派长江局书记任弼时同志负责。江南行委管江苏、浙江、安徽这三个省武装起义。上海首先发动电车工人罢工，结果一部分电车工人罢起工来了，但是有一部分电车工人被黄色工会把持没有罢工，当时上海和记蛋厂有我们一个较有基础的党支部，想发动和记蛋厂罢工，结果组织被破坏。

上海郊区和南通、海门、如皋等县，在1928年5月就有游击战争。特委书记是刘瑞龙同志。1929年冬中央又派从苏联留学回来的黄火青、张爱萍等几个军事干部去领导南通一带的农民起义建立红十四军。1930年6月，红十四军发展到一千多人。1930年8、9月立三路线命令红十四军会攻南通，截断长江，进攻上海、南京，并在9月初与一万多敌人打硬仗，受很大的损失，在敌人围攻下也失败了，打打游击。

安徽是李立三到安庆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结果也没有发动起来。

南京，我党只有一个支部，掌握了国民党很小一部分军事力量，派了全国总工会一个委员来发动暴动，李立三说如果南京暴动胜利，那就是把蒋介石的头砍下来了，好象十月